

就像我的名字一样,我是都安瑶族自治县一个平凡的孩子。都安是我亲爱的家乡。

从都安县城往东十三公里,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,在河对岸,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,就是上岭。上岭是我的祖籍,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,就在这里。

我十岁走去县城看直升飞机、十一岁到公社中学念书、十六岁到更远的地方宜山(今宜州区)读大专,这是都安这片土地上留下我最初的身影和足迹,也在那时候塑造了我的品性和坚韧。20世纪80年代,考上师专就等于拿到早涝保收的铁饭碗,也预示着一生的选择是当一名人民教师。刚踏入河池师专(今河池学院)大门不久,准人民教师的自豪感充盈着我的内心,我将勃发的激情倾注于一首49行的诗——《一个小学教师之死》。这首诗发表在1982年《诗刊》第11期,它一时间让许多人知道诗作者是来自都安的。

这首诗既是宣誓,又是诱惑,后来让我选择了走上文学的道路,也是这首诗。在我青少年时代,也是自治县刚刚成立20多年,都安人还缺衣少食,生活窘迫,砂石公路只通到公社(乡)人民政府所在地。通往大山的还是盘山人云的青石板路,饮用的依旧是池塘里的水,遇上旱年,寻水队伍漫山遍野。我和每一个都安人一样,渴望有朝一日瑶山旧貌换新颜,人民迎来艳阳天。我们不只盼望,我们都在努力着。

我的努力用在我手中的笔。

我毕业分配到菁盛中学只站了一年讲台,就因为文学,调到县文化馆任文艺创作员。在都安工作短短数年,我像一艘本分的船,行靠于单位四楼的宿舍和澄江卫生院职工宿舍(我的爱人是卫生院的医生)间。后来,我住进了澄江河紧靠图书馆河床斜坡上的一间吊脚小木屋。在单位的四楼,在当时都是矮层建筑的县城来说,算是身处高处了。文化馆办公楼的隔壁是电影院。每晚,在四楼逼仄的房间,我立于窗前,俯视电影院前面攒动的人潮,捕捉他们的神情和故事;在居住的小木屋里,我望着从澄江桥上匆匆过往的行人,听澄江流音,视永济桥上图书馆里抱卷渴读的身影。这些人和事成为了我作品的素材,我的文字从这里走向各级报刊。

1989年,我到复旦大学作家班深造。两年后的初冬,我调到《三月三》编辑部当编辑。那



个年代,在都安,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,一个写作者,在县级报刊发表作品,可有机会调到乡里工作,在地区(市级)报刊发表作品,可以调到县里工作,在省级报刊发表作品,可以调到地区工作,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作品,可以调到省里工作。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。

记得那天黎明,我背着行囊,走上通往汽车站的澄江桥。澄江上晨雾如乳,路灯把我不舍的身影投在桥面上。来到桥中,我蓦然回首,宿舍楼下正站着我的母亲,母亲的背景是翠屏山。要离开都安了,我的背后有两个母亲,一个是站在宿舍楼下的那个,一个是都安。她们都在背后用燃烧着爱的火焰的双眼,默默凝视着我,她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和靠山。

我人在南宁,心在都安。都安是我梦里呼唤千百回的名字。

在南宁的30多年里,都安是我乐以示人的名片,我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,都大声地说我是都安人。老乡聚会时,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家乡的人和事,说的都是家乡方言。有时候谈着谈着,双眼就噙满泪花。行走南宁街头,常常与都安老乡“心有灵犀”地相认,彼此会对方坚定的目光和善良的表情中叫一声“老乡”,而后握手递烟,嘘寒问暖,互道平安。也常常因听到家乡发展变化的喜讯而彻夜难眠。

都安人勤劳智慧,淳朴勇敢。都安瑶族自治县成立70年来,特别是近10年来,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光辉,自治县党委、人民政府带领全县各族人民,发扬“雄心征服千层岭,壮志压倒万重山”的豪迈斗志,筭婆拾星辰,铁脚码山河,创造美好生活,都安大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开始调来南宁,去往都安坐4个钟头的客车到都安,到都南高速通车,从南宁一个钟头就到都安,到贵南高铁通车,半个钟头就回到都安。我回家喝的水从池塘水到水柜里的水,再到山泉的自来水,我走进的乡亲的家从摇摇欲坠的木瓦房,到宽敞明亮的楼房,迎接我的乡亲从愁眉苦脸到笑逐颜开。孩子们读书的砖土墙校舍,变成了美丽的现代花园式校园……

澄江国家地质公园、地下河天窗群、红水河三岛湾、龙布日出、凤塘云海、石桥画村、永仁秀美人家,都安四高从荒垠上崛起,城区工业园区、扶贫车间的建成,新人民医院的拔起,密洛陀神韵、壮族扁担舞享誉华夏,书画纸、藤芒编织驰名九州……都安正以勃勃的生机和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还有上岭——我生长的故乡,我的文学原乡,我近些年文学创作的地理标识。这里居住着樊、黄、韦、谭、潘等姓的父老乡亲。这里的

刺梨·火龙果·智能眼镜

锦 璐

这个夏天,被酷暑高温铁桶一般紧紧围困,“立秋”的凉爽渺无踪影,人被蒸得心浮气躁。9月的贵州黔南龙里采风行,便有了逃出生天的窃喜。

果然,一下动车,丝丝凉爽的微风送来早秋问候。和从上海、杭州过来的朋友,由《山花》杂志李寂荡主编招呼吃茶聊天。我们坐在露天茶座里,彼此一再对比落地前后的气温,然后共同感慨贵州的清涼。遮阳伞外面是明晃晃的太阳地,大家云淡风轻地吃豆腐。哈,没错,就是吃豆腐。油豆腐中间开槽,填满辣椒小料,一口一个,咸香油润。这么吃,居然没出汗。曾记得有一个对贵州天气的比喻,“就像把冰箱放在蒸锅旁边”。恰当。

席间免不了讨教。作为一本地方性的文学刊物,《山花》如何连续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。要知道上榜的十四五家纯文学刊物,或是国家队、名牌刊物,或来自经济发达省份。《山花》偏于西南一隅,自然条件、经济条件都无优势,在这样的环境下办刊,不仅成为贵州的《山花》,更成为中国的《山花》,必然有着不一样的政策支持和刊物精神。“把刊物做好,必然要学会拒绝。”李主编说。没错。我的小说上过《山花》,也被《山花》拒过,正为再上《山花》努力。

第二天的采风,便是往山里走,往龙里的大山深处走。贵州和广西地貌相似,深受石漠化困扰。贵州石漠化土地面积更大,居全国第一。石漠化也被称为“地球癌症”,地表之上石山面积大,土壤流失严重,基岩大面积裸露,俗话说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,地表之下却是喀斯特地形极其发育,亿万年时光造成不胜枚举的天然溶洞奇观。贵州荔波喀斯特与广西环江喀斯特天然连成一体,都被列入《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》。30年前我刚参加工作,被单位派往桂西北的河池巴马驻村开展扶贫工作。还记得一路西去,举目荒山,山峰峥嵘,瘦嶙嶙的只有骨架。晃眼的日光下,二级公路上尘土飞扬,热风

滚滚,七八个小时车程下来,整个人从头到脚,舌尖、齿缝、眼皮、毛发,无不挂一层浮尘。现在想来,仍然心有余悸。

之所以想当年,必定是现在已是“面目全非”。而这个变化,自然是往好了去,往今非昔比、山乡巨变的方向上靠拢。站在龙里河大桥上,这个感受更深。龙里河大桥全长1260米,是世界跨径最高的高山峡谷景观斜拉桥。桥在群山之巅,两座红色空心钻石形索塔,牢牢拴住168根斜拉索,横跨在深邃开阔、青绿盎然的朵花大峡谷上,像天地间一架巨大的竖琴。桥面到谷底273米,一湾平湖盈盈不语,湖面的近处和远处,是万里晴空下或浓或淡的山峦及森林的倒影。那是一种浩荡沉静的美。重庆诗人李元胜向我们挥手暂别,拎上备有便携鱼竿的背包,在峡谷悠然独行,寻了好几处水面甩杆。我们在微信群里看到他发来的图片,一尾不到半尺的活泼小鱼滑下他手掌,摇头摆尾划向水面,油亮的黄鳞上绕着一环又一环黑色条纹。他解说不,这是他想解锁的红腹溪斑,而且在这个点位连拉三个。有人懂行,说这种鱼对水温和水质要求很高。李元胜说,他在重庆从来没遇见过。我在心里说,所以喽,这就是贵州,这就是龙里。

转头进了更深的山,走进谷脚镇茶香村。山路十八弯,每一弯都迎头撞上一片又一片沉甸甸的刺梨果林。果树如灌木并不高大,果实个头如广西砂糖桔大小,果皮呈纯粹的明黄色,密布小刺,坚硬扎手,有些像长了刺的小菠萝。刺梨原是西南山区的天然野果,近二十年在贵州大面积人工种植。刺梨凭借强大的根系、耐旱能力和对贫瘠土壤的适应力,为石漠荒山披上绿衣,给喀斯特山区的生态恢复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刺梨是水果界的维C担当,每100克鲜果中维生素C含量可达2000毫克以上,是猕猴桃的15倍、番茄的73倍、柑橘的360倍、苹果的500倍……在科技加持下,贵州又在刺梨

精深加工上先行一步,成为全国刺梨产业的策源地和引领区。

正赶上贵州龙里2025刺梨节。山间难得的一块平地上,搭起一片花花绿绿的展台,直播带货的镜头里人头攒动。展销的刺梨产品,有原浆、有饮料、有果冻、有果干,还可以作为配料入菜入汤,甚至还有刺梨护肤品。龙里几日,每餐都有刺梨饮料。第一次喝,毫无戒备,说不出是苦,还是酸,竟然还有隐隐的涩,不觉得好喝。看看同行伙伴,似乎都缓了一下,才下咽。如此说来,从相貌到口感,刺梨都非讨好型水果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常年把番茄当早餐水果,如果不是被刺梨的维C含量惊到,我绝不会带走两箱沉甸甸的刺梨原汁。在回来的一周里,我停了咖啡奶茶,专注地喝刺梨原汁。味蕾渐渐觉醒,开始感觉到刺梨清爽天然甚至带有层次感的草木本味。

口感偏好是被塑造的,而健康是被唤醒的。这个论断并非我的独家发现。表面上是说口感和健康之间的关系,实则人类终其一生,都在理性思维与本能冲动之间做钟摆,都在短期欲望与长期利益之间做权衡。遇到了刺梨,我不过是把人生道理又短短长长地感悟一回。

既然都是石漠化地区,广西有没有刺梨?有没有刺梨产品?上网一查,有,但不多,种植区集中在乐业一带,产品类型还停留在饮料加工。有些着急,就是那种不愿被他人拉开差距,渴望拥有同等甚至更好条件的急切。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。既然要改造石漠化地区,广西怎么出牌?出的什么牌?这些年多次往桂西北去,灼烫的阳光里,满目都是不毛石山的景象不复存在。或浓或淡的绿,或浅或深的绿,桂西北有了颜色,有了绿水青山的生动。在事实面前,我的信息严重滞后。

从山里回来的路上,我一直在网上查询。原来,广西人果盘里的百香果、毛葡萄、脐橙、火龙果、蟠桃、枇杷……这些在石缝间的绿意生长,成就了广西石漠化地区的甜蜜收获,是广西水果产量连续保持全国第一、广西人实现“水果自由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特别是平果市早在2001年开始的“果化模式”——种植具有耐干旱、耐贫瘠、根系发达、保持水土等特性的火龙果,发展立体生态农业,既能保护山林又能改善民生。在这20年里,给西南8个省份,300多个县的石漠化治理提供指导方案,为治疗“地球

青山秀水滋养了都安人世代同心同德,和睦相处。一家有难,八方来助,每有喜事,全民同乐的品性。时序飞转,特别是我离开上岭后,这里父老乡亲都和安的山山万弄的人民一样,走上了康庄大道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小说大多的人物原型来源于斯。近些年来,县人民政府把上岭打造成为文旅打卡地标,以我获骏马奖作品《上岭恋人》的故事和人物为元素,建起了“上岭恋人露营地”“四季民歌露营地”等,还开发了相应的文旅产业,以此再现都安新时代乡村变化的缩影,让我每一次回归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,特别幸福和温暖。

都安是我敬爱的母亲和靠山,她对在外游子的呵护和关爱令我动容。2024年,我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,县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庆祝座谈会,并给予奖励。我深切感到了一个孩子得到母亲的恩宠和肯定。令我尤为高兴和欣慰的是,在这次活动中,我看到了都安从事文学的旧身影和新面孔,他们当中有门卫,有司机,有农民,有教师……他们正在薪火传承,书写他们热爱的这片神奇的土地。

那天黎明离开都安,至今转瞬30余载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少年时代,我们无数次通过梦境的魔法逃离故乡,有朝一日成了城里人,日久天长,日里梦里,我们声声呼唤故乡的名字,也一次次身临其境回到故乡。

值此都安瑶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之际,祝福我亲爱的家乡永远魅力无限,大放异彩!

【作家简介】

凡一平,本名樊一平,壮族,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人。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、复旦大学中文系。第十二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,广西文联副主席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跪下》《顺口溜》《上岭村的谋杀》《天等山》《蝉声唱》《顶牛爷百岁史》等十部,小说集《上岭恋人》《撒谎的村庄》等十四部。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、百花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双年奖等。有作品被翻译成瑞典、俄、越南、马来西亚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。

癌症”开出了一剂“中国良方”。这么说来,广西的火龙果相当于贵州的刺梨喽?了解到这些,我便平衡了,踏实了,脸上流露出隐秘的笑。

晚上在县城散步,路过一处水果店。有火龙果。问店家,是红心的吧。他说是。我没挑,随手拿了一个。我相信这个火龙果一定是甜的,一定会把手指、嘴唇、舌尖染上艳艳的玫红色。它可能来自广西,也可能是贵州本土,没准还来自长江以北,有报道说山东、宁夏也开始种火龙果了,实现“南果北种”。科技与生态的握手,早已打破“橘生淮北则为枳”的古老界限。这种共享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流通。好的事物不再被山河阻隔,成为所有人触手可及的美好。

不由得,又做了一番沾染职业病的随想——文学何尝不是如此?真正的文学从来不会囿于一城一地,不会被地域、语言、文化所阻隔。人类对美好故事的渴望,终将让所有精心培育的叙事,找到心灵的归属。

返程那天,第22届中国—东盟博览会暨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。风驰电掣的高铁上,我不断刷手机,开幕式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佩戴智能眼镜的新闻火遍全网。这则新闻于我而言,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展示,更是一种深刻的提示——打破界限。打破想象的界限、地域的界限、资源的界限,甚至打破宿命的界限。科技能打破石漠荒山的封锁,重塑生态;文学能打破地域语言与文化的阻隔,直抵人心。我们将身体力行的,是以创新之力打破种种边界,让所有渴望美好的心灵,于更广阔处相逢。

【作家简介】

蒋锦璐,笔名锦璐,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,现供职于广西作家协会。中短篇小说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》《长江文艺》《青年文学》等刊物,有小说集《双人床》《美丽嘉年华》、长篇小说《一个男人的尾巴》、散文集《绚丽之下 沉静之上》等出版。曾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新世纪优秀中篇小说奖、《广西文学》优秀作品奖等,有作品入选第五届“城市文学”排行榜。